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年 6 月　第 27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Jun. 2026, 27(3):57–6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7

# 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民协商参与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优化

## ——基于四川JY市“村民说事”的案例考察

李春梅，刘瑞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97）

**摘　要**：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培育—共生模式创新—共生环境优化”的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的案例考察发现：JY市通过在数字赋能场景下建立线上直播议事与线下兜底服务相结合的技术使用机制，在农旅产业融合中实现文化嵌入与利益联结的双重驱动，在特色产业链条上构建农民、企业与农技专家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生共同体，推动了农民协商参与的实践创新。其内在逻辑机制主要体现在：在党建引领下以全过程协商为核心促进共生单元培育，以“说—议—办—评”为链条推动共生模式创新，以政策、技术与文化的协同赋能促进共生环境优化。该模式有效推动了农民从治理“边缘参与者”向“核心共生主体”转型，能够为破解西部乡村协商参与的主体边缘化、参与碎片化和监督虚化难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方案，为健全乡村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制度参考。

**关　键　词**：村民说事；协商参与；乡村全面振兴；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D638；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6)03–0057–10

#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farmers’ 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in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 —A case study of villagers’ deliberation in JY City, Sichuan Province

**LI Chunmei，LIU Ru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9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the cultivation of symbiotic units, the innovation of symbiotic model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Villagers’ Deliberation” mechanism in JY City,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veals how JY City has driven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farmers’ 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Specifically, the city has established 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echanism integrating online live-streamed deliberation with offline support services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achieved dual drivers of cultural embeddedness and interest connec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nd built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along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hain involving farmers, enterprises, a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is model operate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cultivating symbiotic units via whole-process consultation under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promoting symbiotic model innovation through an integrated chain of “discussion–deliberation–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symbiotic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empowerment of polic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is model has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from “marginal participants” to “core symbiotic actors” in rural governance. It offers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addressing challenges such a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articipants, fragmented participation, and ineffective supervision in western rural areas.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ystem and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villagers’ deliberation; 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jectivity

**收稿日期**：2026 – 03 – 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3BZZ032）

**作者简介**：李春梅（1982—），女，四川德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基层治理。

##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擘画“三农”发展时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乡村全面振兴的本质是农民主体性的回归与激活，农民协商参与不仅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制度化实践，更是破解乡村治理悬浮、内生动力不足、公共事务落地难的关键路径，直接关系基层民主成色与乡村全面振兴质效。“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稳则国家稳”[2]，《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进一步强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创新协商议事形式以保障农民主体地位①，切实保障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村民说事”作为基层原创性民主实践，以制度化平台打通民意表达、议事决策、监督反馈全链条，推动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转变[3]，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农民有效协商参与的典型范式，研究该模式对完善西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界围绕农民协商参与从三类视角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一是主体性视角，重点关注农民参与意愿、身份认同与组织化动员，认为制度化议事平台能够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意识，推动村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建构”[3]，通过固定议事机制、多元表达渠道保障农民话语权，使其真正成为村级事务的决策主体[4]。二是制度性视角，侧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切入，认为“村民说事”实现了政策规则与乡土逻辑的有机衔接，党组织引领与村民自治协同发力，形成“自上而下统筹”与“自下而上表达”双向赋权格局[5]，通过法治保障、程序规范提升协商制度化水平[2]。三是实践性视角，聚焦议事流程优化与技术赋能[6]，强调数字技术的融入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显著提升农民参与便捷度与政治效能感[7]，但也需警惕技术依赖、信息失真等潜在风险[8]。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民协商参与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缺失。第一，研究视角碎片化，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现有成果多单独聚焦主体、制度或技术单一维度，难以回应乡村全面振兴对农民协商参与提出的系统性、协同性要求。第二，案例场景同质化，对西部乡村特殊性关照不足。现有研究多以浙江象山等东部发达地区为对象，其模式建立在人口集聚、产业成熟、财力充沛基础之上，对西部乡村普遍面临的老龄化、空心化、居住分散、产业薄弱、参与动力不足等现实约束回应不够，难以形成适配西部场域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方案。第三，理论与实践衔接不足。多数研究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未能将基层实践上升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尤其缺乏以共生、协同等系统理论解构议事机制的深层逻辑，导致优化路径通用性强、针对性弱，无法回应西部乡村差异化治理需求。

当前乡村全面振兴向纵深推进，农民协商参与的制度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但西部乡村地区受老龄化、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等现实条件制约，农民协商参与仍面临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制约。农民主体功能边缘化、协商过程碎片化、监督保障虚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破解，农民在村级事务决策、产业发展、利益分配中的实质性参与不足，全过程协商链条难以贯通，监督反馈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既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也制约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为此，立足西部乡村现实场域，探寻农民协商参与的有效实现形式，破解参与困境、畅通参与渠道、完善保障机制，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亟待回应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命题。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以西部乡村农民协商参与面临的主体边缘化、协商碎片化、监督虚化三重困境为切入点，构建“主体—机制—环境”整合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编码+共生理论统合”的组合研究策略，以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为实证案例，重点揭示老龄化、空心化场景下农民协商参与的突破路径，系统阐释“村民说事”多元共生、闭环运行、文化赋能的运作逻辑，提炼具有西部特色的理论增量与实践经验，为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提升西部乡村治理效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学理支撑与可复制方案。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

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既指不同种属因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也

泛指共生单元在特定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关系。伴随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共生理论逐步被引入政治学、社会学与公共治理研究，其内涵从自然生态关系拓展为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的互动结构、运行机制与演化逻辑。在治理场域中，共生理论超越了单一主体主导、线性管控的传统思维，更加注重系统的整体性、主体的平等性、关系的互惠性、运行的动态性以及结构的稳定性，强调各类主体在明确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利益联结与风险共担，进而提升系统整体运行效能。

进入中国基层治理研究语境后，共生理论进一步实现了本土化转化与理论创新，形成更适配乡村治理实践的理论形态。共生理论在中国本土实践中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以党建引领为根本方向、以农民主体为价值立场、以互惠共生为核心机制、以全过程协同为运行形态[9]，强调多元主体在治理场域中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结构性关系，而非短期、松散、功利化的合作关系。例如，张喜红等以共生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设路径[10]。钱泽森等运用共生理论探索城乡融合型都市乡村发展模式[11]。王庆生等将其用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12]。当前，共生理论已超越传统“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单向竞争逻辑，更加强调多元主体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互利共生的系统演进规律，不仅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更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示范价值的治理方案[13]。

相较于协同治理、合作治理等相近理论，共生理论具有三项独特优势。第一，共生理论强调结构性关系而非临时性协作，更关注主体间长期、稳定、制度化的联结方式。第二，共生理论突出互惠性均衡，强调各方在功能互补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非单向赋能或行政支配。第三，共生理论包含“单元—模式—环境”三维系统，能够同时解释“谁来参与、如何参与、何以持续”三大核心问题，解释力更完整、更具穿透力。由此，共生理论为理解农民协商参与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优化路径提供了兼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分析工具。

### （二）共生理论与农民协商参与的内在契合性

将共生理论引入农民协商参与研究，并非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建立在深刻的内在契合基础之上。从主体结构、运行机制、外部支撑三个维度来看，共生理论与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的农民协商参与具有高度同构性，能够为实践分析提供稳定的理论锚点。

在主体结构层面，农民协商参与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主体共生系统。乡村协商并非由单一主体推动，而是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核心、以农民群众为参与主体、以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为协同力量的多元互动格局[14]。党组织发挥方向引领、资源整合与规则供给作用，农民承担诉求表达、议事决策与监督评价功能，企业、合作社、乡贤、技术专家等提供专业支持与市场化助力。共生理论所强调的“多元共生单元”，恰好与农民协商参与的主体结构高度匹配，能够有效解释主体功能错位、农民边缘化、参与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在运行机制层面，农民协商参与依赖闭环化、制度化的互动模式，与共生理论强调的共生模式内在一致。有效的农民协商必须包含诉求表达、议事协商、决策执行、监督反馈、成效评价等完整环节，形成稳定可重复的运行流程。“村民说事”所遵循的“说—议—办—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范化的共生互动模式，能够减少参与碎片化、形式化、议事不落地等问题。共生理论对互动规则、利益联结、过程监督的关注，与农民协商参与对程序正义、实质参与、落地见效的追求高度契合。

在外部环境层面，农民协商参与的长效推进离不开政策、技术、文化、资源等外部条件的系统支撑，与共生理论中的“共生环境”形成完整对应。政策制度为参与提供合法性与刚性保障，数字技术降低参与门槛、突破时空限制，乡土文化增强身份认同与参与意愿，产业发展与资源投入则提升参与的现实价值与获得感[15]。共生理论将环境视为系统运行的重要条件，能够有效解释为何部分地区议事实践难以持续、农民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从而为优化支撑体系提供理论指引。总体来看，共生理论与农民协商参与在结构、机制、环境上高度契合，具备坚实的理论适配性与实践解释力。

### （三）共生理论的三维分析框架

基于共生理论核心要义及其与农民协商参与的内在契合性，本文在共生单元培育、共生模式创新和共生环境优化层面构建分析框架。三者并非简

单并列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理解农民协商参与的完整理论体系。

第一，共生单元培育是农民协商参与的基本前提，解决“谁来参与”的基础性问题。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主体，其结构均衡、功能互补是系统有效运转的先决条件。在农民协商参与中，共生单元主要包括基层党组织、农民群众、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与专业力量等。党组织作为引领单元，承担方向把控、流程规范、资源整合等职能。农民作为核心单元，是诉求表达、决策参与、监督评价的主体。市场与社会主体作为协同单元，提供产业、技术、服务等专业化支持。只有通过共生单元培育，明确各主体角色，理顺权责关系，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才能避免行政替代、农民失语、主体失衡等问题，为协商参与奠定稳定结构基础。

第二，共生模式创新是农民协商参与的运行核心，解决“如何参与”的关键性问题。共生模式是多元主体实现互动的规则、流程与机制，直接决定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与实际效能。农民协商参与的有效性，依赖诉求吸纳、分类议事、分层决策、闭环监督、成效反馈等一整套机制设计。创新共生模式，能够将分散、随机、碎片化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有序、规范、可持续的协商过程，实现参与从“形式化”向“实质化”、从“阶段性”向“全过程”转型。共生模式创新是连接主体与环境的关键枢纽，也是破解协商不畅、参与弱化、监督虚化的核心路径。

第三，共生环境优化是农民协商参与的长效保障，解决“何以持续参与”的支撑性问题。共生环境为单元培育与模式运行提供外部条件，包括政策制度、数字技术、乡土文化、资源保障与社会氛围等。良好的共生环境能够降低参与成本，提升参与动力与获得感，使农民协商参与从短期试点走向长期制度化运行。政策环境提供合法性与资源支持，技术环境拓展参与渠道、提升效率，文化环境增强认同与共识，资源环境保障议事落地见效，共同为农民协商参与提供稳定、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行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共生单元培育—共生模式创新—共生环境优化”三维分析框架（图1）。其中，共生单元培育是农民协商参与的基本前提，解决“谁来参与”的主体结构问题。共生模式创新是农民协商参与的运行核心，解决“如何参与”的机制流程问题。共生环境优化是农民协商参与的长效保障，解决“何以持续参与”的外部支撑问题。三者呈现“前提—核心—保障”的递进逻辑与互动关系，共同构成解释“村民说事”实践、破解农民协商参与困境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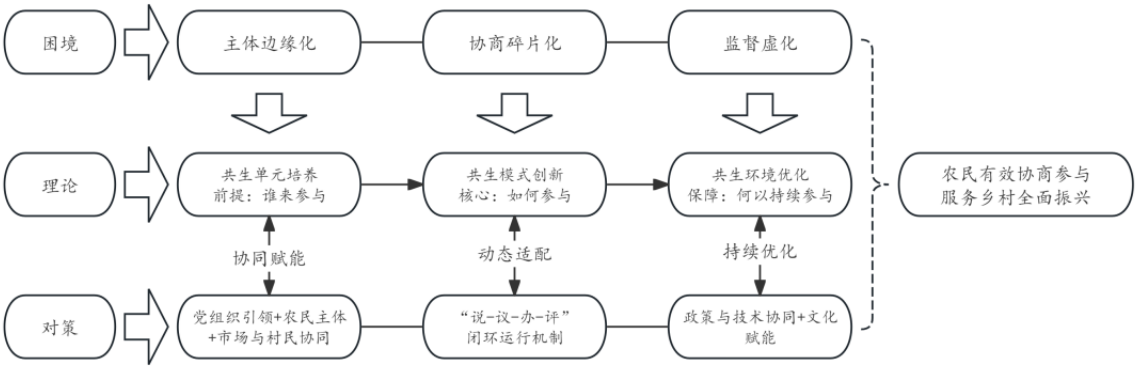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共生理论的农民协商参与三维分析框架

## 三、案例呈现：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的实践探索

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挖掘其内在运作逻辑，提炼先进经验，进而为推动农民协商参与提供新思路。为科学解析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模式的运作逻辑，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四川省JY市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系统编码分析，提炼其推动农民协商参与的核心机制。研究以2025年6月在四川省JY市XA镇、QL镇、FS镇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共开展深度访谈30余人次，涵盖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等，收集访谈录音转写文本15余万字，符合信息饱和原则，同时辅以乡镇政策文件、工作日志、新闻报道等次级资料，形成多源数据交叉验证体系，以此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考察四川省JY市“村

民说事”推动农民协商参与的创新实践[②]。

（一）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本文在完成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相关资料搜集和整理后，将所形成的文本资料进行归纳，首先从文本资料中进行开放性编码，提取“直播说事”“党员包片”“民宿开发协商”“意见反馈”“技术培训说事”等初始概念，合并同类项后形成9个范畴，按类型分为主体类、机制类、环境类，分别对应多元行动者、说事运作规则与外部支撑条件。再通过轴心编码梳理范畴逻辑关联，提炼出“共生单元协同”“动态适配说事”“赋能环境支撑”3个主范畴，构建“主体—机制—环境”互动框架。主体以村党组织为核心，联动农民、企业形成功能互补网络。机制针对不同事务设计“即时解决”或“多轮协商”的弹性机制。环境依托数字技术、乡土文化与政策资源保障说事落地。最后以“共生理论”为核心范畴进行选择性编码，搭建“共生单元培育—共生模式创新—共生环境优化”的分析框架，揭示该模式推动农民从“被动听政”向“主动议事”转型的逻辑。基于上述三级编码过程，最终形成“村民说事”模式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结果，系统呈现编码层级、范畴关联与资料依据，为后续模式机理分析与实践经验提炼提供清晰的理论载体[③]。

具体编码结果如下：

共生单元培育。主要涵盖村党组织引领、农民主体参与、企业协同介入三个维度。村党组织通过党员包片走访、规范议事流程、整合多方资源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农民借助直播说事、坝坝会、田间课堂等渠道参与产业共商与诉求表达。企业围绕民宿开发、产业合作、市场拓展等实现协同共治，共同构成多元互动的共生主体体系。

共生模式创新。主要包括分类说事渠道、分层协商流程、闭环监督机制。借助线上直播、线下议事、田间说事等拓宽诉求表达渠道。通过日常事务即时协商、重大事务多轮论证提升决策科学性。构建动态高效的运行模式，形成意见反馈、月度评议、结果公示、绩效挂钩全过程监督闭环。

共生环境优化。主要包括数字技术支撑、乡土文化赋能、政策资源倾斜。直播平台、说事小程序等降低了参与门槛，蜜桃文化、李白文化等本土元素嵌入议事场景增强情感认同，产业资金、技术培训、设施改造等为协商参与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支撑环境。

（二）案例基本情况

四川省JY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四川省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县[④]。然而，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辖区内乡村普遍面临老龄化、空心化、居住分散化等现实问题，传统线下议事模式难以实现全覆盖，农民参与渠道有限、意见表达不畅，协商参与多呈现被动化、形式化、碎片化特征。与此同时，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土地规模化流转又催生了新的利益协调需求。随着村集体经济发展、土地规模化流转与产业项目不断落地，乡村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农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需求日益凸显，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四川省JY市立足西部乡村实际，将数字技术、本土文化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逐步探索形成“村民说事”制度，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田间地头联动、文化场景嵌入的方式，为农民搭建常态化、制度化、便捷化的协商参与平台，有效破解农民“说不上话、参不了政、监不到权”的现实困境。

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是以党建引领、地域特色、文化习俗、产业发展等为纽带，逐步探索形成的农民协商参与模式。从实践形态与内在机理看，这一模式可界定为党建引领下，以农民为核心主体、以全过程协商为运行链条、以共生共治为内在机理的深度适配西部乡村发展现实的制度化协商参与模式，即“共生型协商议事模式”。该模式以“说—议—办—评”为链条，将农民协商参与嵌入村级治理全周期，形成参与主体多元化、议事渠道多样化、监督反馈闭环化的稳定运行体系。在此基础上，该模式将四川省JY市乡村特色活动与乡村社会治理相结合，通过“直播议事”“农旅议事”“产业议事”等形式，畅通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推动农民深度参与乡村各类公共事务的讨论、协商与监督，进而实现农民有效协商参与的目标。

（三）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的具体实践形态

四川省JY市辖区内乡镇陆续探索推出“村民说事”相关平台，这些平台在核心理念、运作逻辑以

及实际效用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既成功保留和弘扬了地方特色习俗，也极大动员了乡村主体力量，实现了农民协商参与的提质增效。为了更好把握“村民说事”的具体情况，本文重点考察了四川省JY市打造的三个代表性乡镇案例。

1. “直播议事”：数字赋能降低共生成本，破解分散参与困境

XA镇将新媒体直播技术与基层议事深度结合，打造“直播议事”平台，由镇、村两级干部定时上线，与农民开展实时互动。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拓宽参与渠道，更在于以技术赋能大幅降低乡村协商的共生成本，让居住分散、行动不便的农民以极低门槛接入协商网络，实现“随时说事、随地议事、即时反馈”，有效化解西部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带来的参与阻隔。为提升参与覆盖面与针对性，XA镇还开设“XA人讲心安事”“社治‘新’说”以及“心语解‘新’结”等特色栏目，聚焦民生热点、矛盾调处、政策解读等内容，让议事内容更贴近农民生活。当地干部在访谈中明确提到：“直播栏目通过直播平台，让群众全方位了解基层群众协商参与工作，提升安全感，同时也能回答老百姓的问题。”（访谈样本：250623-XAZ-DHF）为弥补数字鸿沟，XA镇同步建立线下兜底机制，针对老年群体、不熟悉智能设备群体，由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上门走访、代为发声、现场反馈，实现线上议事高效化与线下议事兜底化互补，避免技术赋能带来的参与排斥。在常态化议事过程中，不少村民也直观感受到：“现在讨论种植特色水果，不只是算经济账，还会想怎么把老祖宗的手艺传下去，感觉自己成了村里的‘文化传承人’。”（访谈样本：250623-HTC-LCQ）通过固定时段直播、议题提前预告、意见实时收集、结果及时反馈，XA镇将过去“干部讲、群众听”的单向模式，转变为“干部群众共商共议”的双向互动模式，有效降低了农民参与门槛，让协商参与变得可视、可感、可及。

2. “农旅议事”：文化作为共生界面，以情感认同激活协商内生动力

QL镇依托李白文化资源优势，以农旅融合项目为抓手，将议事场景嵌入产业发展全过程，让农民在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化协商参与。李白文化并非简单的装饰元素，而是充当多元主体互动的共生界面，通过共同文化记忆、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化解利益分歧、凝聚共同体意识，使协商从单纯的利益博弈转化为情感共鸣下的共识共建，内生协商动力显著增强。以QL镇双石村翠微田园民宿项目为例，该村采取“村集体+村组干部+农户+社会资本”模式，在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等各个环节，均通过“村民说事”广泛吸纳农民意见，大到房屋风貌、格局设计，小到定价标准、收益分配，均做到事前协商、事中沟通、事后公示。当地村党支部书记介绍：“我们准备将村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文旅产业，有意愿的村民可以参与进来，村集体出资打造小宅，发展文旅产业。”（访谈样本：250624-SSC-LS）在民宿日常运营中，村干部也切实做到：“你看我们翠微田园围墙和大门都没有，老百姓到了晚上随时来这里跳坝坝舞，摆摆龙门阵，因为这里灯火通明、气氛和谐。老百姓信任我，我们也将村集体产业做好，让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利益。”（访谈样本：250624-SSC-LS）文化嵌入使协商参与超越经济理性算计，形成情感、价值、利益三重共生，农民从“被动参与议事”转向“主动守护共同体”，极大降低协商成本、提升议事效率，实现协商参与与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的同频共振。

3. “产业议事”：利益为共生锚点，构建稳定利益共生体

FS镇立足蜜桃特色产业基础，以“产业议事”为核心载体，把议事会场搬到田间地头、合作社、产业基地，让农民围绕蜜桃种植、技术培训、品种改良、品牌打造、市场销售等最关心的问题说事议事，实现产业发展到哪里，协商参与就延伸到哪里。蜜桃产业链构成多元主体的“利益共生锚点”，将农民、村干部、农技专家、市场主体紧密绑定为“利益共生体”，使协商从“要我议”的外部要求，转变为“我要议”的内在需求，协商动力源于利益联结，参与行为服务共同利益。在议事过程中，镇村干部、农技专家与农民面对面交流，及时解答农民在种植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协助解决农资、农机、灌溉、仓储等实际问题。当地干部谈道：“我们FS镇盛产蜜桃，长期跟农科所的同志开展合作，一旦老百姓在种植方面遇到问题，我们就及时联系，让他们来帮助解决。同时也可以下到田间地里，了解

农民的最新需求。”（访谈样本：250624-FSZ-ZTY）村民们也切实感受到：“我们通过蜜桃产业，将村民联合起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为村民寻找销路。另外，村民一旦有任何问题，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解决。”（访谈样本：250624-BYC-TN）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也尽力为农民做好技术帮扶工作：“平常时候，有些老百姓在种植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比如肥料、农机方面，我们也会联系农科所相关同志，同时安排我们的志愿者对点进行帮扶。”（访谈样本：250624-FSZ-ZTY）镇级层面也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关于我们镇上村民反映的问题，相关负责人随时会到现场察看，确保现场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且及时了解后续推进情况，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访谈样本：250624-QLZ-SJ）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利益共生，使多元主体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稳定关系，协商内容务实、议事效率提升、执行动力充足，真正实现协商参与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综上，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的实践探索，精准回应了西部乡村农民协商参与面临的三重现实困境。一是XA镇“直播议事”通过即时互动、全程公开、线上直达，破解协商碎片化问题，让分散农民能够便捷、连贯、有序参与议事。二是FS镇“产业议事”以蜜桃产业联结农民、组织农民、赋能农民，破解主体边缘化问题，让农民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真正成为协商参与的主体。三是全域推行的闭环监督机制与“说—议—办—评”全流程制度，通过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全程可监督，破解监督虚化问题，让农民协商参与从“形式参与”转向“实质参与”，从“被动参与”转向“深度参与”。

## 四、“村民说事”推动群众协商参与的运作逻辑

将共生理论引入农民协商参与研究场域，能够为解析“村民说事”的内在机理提供清晰的分析视角。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是立足西部乡村老龄化、空心化、产业薄弱现实形成的共生型全过程协商参与模式，推动农民从边缘参与者转变为核心共生单元，形成分工协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性互动格局。

### （一）共生单元培育：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与角色重构

共生单元是协商参与的主体基础，其结构均衡与功能互补直接影响协商质量。四川省JY市实践打破对党组织、农民、市场主体作用的简单罗列，形成三者功能互补、目标协同、利益均衡的结构化运行机制。在乡村协商场域中，市场主体遵循效率逻辑，以成本控制、收益最大化、产业扩张为核心取向。农民遵循公平逻辑与情感逻辑，更关注土地权益、收益分配、就业保障与乡土秩序。基层党组织扮演着中介者与转换器的关键角色，在效率逻辑、公平逻辑与情感逻辑之间搭建起缓冲、协调与整合的平台，从而避免三者直接碰撞引发协商僵局。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把市场效率诉求转化为可协商、可分步、可保障的治理议题，同时把农民公平诉求与情感需求转化为规范化、可落地、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推动效率逻辑与公平情感逻辑从对立走向兼容。

当企业与农民出现目标冲突时，JY市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协调机制。如QL镇民宿项目运营中，文旅企业希望降低人力成本、减少本地用工，村民则坚持优先本村就业，双方一度出现协商分歧。村干部在访谈中提到：“企业要算账、群众要安稳，两边都有理，不能压着任何一方，只能坐下来慢慢商量。”（访谈样本：250624-SSC-LS）面对此类冲突，JY市通过“三方恳谈+利益折中+长期绑定”机制化解矛盾。党组织牵头召开专题议事会，充分听取企业成本诉求与村民就业诉求，并且设置利益保障底线，明确村民优先就业、收益保底分配、运营公开透明三项刚性原则，同时采取核心岗位村民负责、辅助岗位企业统筹的分层用工模式，既满足企业效率需求，又守住农民公平底线。这种协调机制使党组织成为多元主体的“稳定器”与“黏合剂”，通过规则供给、过程协调、利益整合实现功能互补，推动形成“党组织引领、农民主体、市场协同”的稳定共生结构。

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单元，通过“党建+议事”制度化嵌入，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资源整合能力，不替代、不包办，为平等协商留出制度空间。农民作为核心单元，贯穿诉求表达、议事决策、监督评价全过程，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共

建者”，主体性得到系统性激活。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作为协同单元，提供产业、技术、服务专业化支撑，补齐基层治理能力短板，三者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治理“行政单向推动、农民被动跟随”的局限，为农民实质性协商参与奠定稳定主体结构。

**（二）共生模式创新：从“单向推动”到“协商共治”的闭环互动**

共生模式是协商参与的运行核心，四川省JY市以“说—议—办—评”为链条，构建“诉求表达—协商议事—决策落地—执行监督”的全过程闭环，破解传统参与单向化、碎片化、阶段化局限，实现从形式参与向实质参与转型。全过程闭环的运行逻辑，将分散化、临时性的参与行为整合为制度化、常态化、可追溯的协商过程，使协商参与贯穿村级治理全周期、各环节，从机制层面消解参与虚化、流程空转等治理难题。

诉求表达环节构建多渠道、常态化、全覆盖吸纳体系。通过走访收集、线上直播、定点说事、专项收集等方式，全面吸纳农民日常诉求、产业诉求、权益诉求，从源头避免诉求被忽略、被过滤，为后续协商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多渠道吸纳机制有效打破了传统议事渠道单一、覆盖有限、响应滞后的局限，尤其适配西部乡村居住分散、老年人居多的现实条件，使农民诉求能够便捷、顺畅、完整地进入治理议程。

协商议事环节实行分层分类、规范透明的运行机制。坚持日常事务简易议、常规事务定期议、重大事务多方议，议题、规则、过程、结果全程公开。相较于偏重程序刚性与流程标准化的既有议事实践，JY市更强调协商内容与乡村产业、生活场景、文化认同的内在契合，以共识兼容提升协商可持续性[16]，有效避免议事空转、决策难产、落地困难。分层分类议事既提升了小微事务的处置效率，也保障了重大事项的决策科学性，实现协商民主与治理效能的有机统一。

决策落地环节凸显议办衔接市场化、协同化独特性，是JY市“村民说事”模式相较传统实践的关键创新。传统议事多以行政力量推动执行，而JY市在产业发展、项目运营等关键领域，更加注重以市场逻辑、合作纽带与利益共同体支撑决策转化，协商成果依靠多方协同推进，而非单纯依赖行政指令完成。决策形成后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落地标准，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评价的行动方案，核心是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让农民从“参与议事”到“看见实效”。市场化协同机制使决策执行更具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也让协商结果真正契合农民利益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显著提升农民的参与获得感与政治效能感。

**（三）共生环境优化：政策、技术与文化的协同赋能**

政策制度环境提供刚性、稳定、可预期的保障。JY市将“村民说事”纳入市级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通过制度化文件明确议事经费保障、人员配备标准与考核激励权重，把协商成效、办结效率、群众满意度纳入刚性考核指标，改变以往议事实践依赖基层自发探索、资源保障不足的状况[17]。政策突出赋权、明责、保供导向，将分散化、临时性的议事活动转化为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责可究的刚性制度，有效降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交易成本，强化制度运行约束力与可持续性，为协商参与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与行动框架。

技术支撑环境实现低成本、广覆盖、无障碍赋能。针对西部乡村居住分散、老龄化突出等问题，JY市以直播议事平台拓展参与边界，实现固定时段议事、全程留痕、诉求闭环管理，大幅降低农民参与成本。同步建立线下兜底服务机制，由网格员、村干部为不便使用智能设备的村民提供代诉、代议、代反馈服务，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兜底有机统一，避免数字排斥与参与不公，真正做到协商参与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文化认同环境注入情感动力与共同体意识。JY市将李白文化、蜜桃产业文化、乡土记忆嵌入议事全过程，让协商不仅是利益协调，更是情感联结、价值认同、共同体培育过程。农民在参与中形成强烈归属感，协商动力从外部推动转向内生自觉，乡土文化所涵养的公共精神与信任基础，有效减少沟通摩擦、提升共识效率。社会信任环境是柔性监督与底线约束的重要补充。立足西部熟人社会特质，JY市充分运用乡贤声望、村规民约、长期议事实践积累的信任资本，构建有温度的监督、有底线的信任，将人情社会从监督软化的诱因转化为降低协商成本、提升议事效率、强化履

约自觉的社会资本，为共生关系稳定延续提供最深层支撑。

政策、技术、文化、信任四维协同，从刚性制度、便捷技术、深层文化、社会信任四个层面形成闭环支撑，既强化运行保障硬度，又提升参与场景温度，更增强长效发展韧性，构成适配西部乡村实际、兼具规范性与生命力的共生支撑体系。

## 五、优化农民协商参与的实践路径

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以共生理论为内在机理，构建起适配西部乡村场域的共生型全过程协商参与新模式，精准回应了农民主体边缘化、协商碎片化、监督虚化三重现实困境，为破解西部乡村农民协商参与难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健全农民协商参与制度体系，推动“村民说事”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方向纵深发展，需紧密围绕“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维框架，结合产业共生、文化共生、信任共生的实践特质综合施策。

第一，以对称性互惠利益联结为核心，强化共生单元的主体根基。强化共生单元培育并非开展泛化的能力培训与参与激励，而是以对称性互惠为导向，重构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配置与利益联结关系。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强化规则供给、利益均衡与冲突协调的中介功能，在市场效率逻辑与农民公平情感逻辑之间建立制度化缓冲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在协商中实现地位对等、权利对等、机会对等。在产业发展、农旅民宿等实践场景中，通过股份合作、保底收益+按股分红、优先就业、服务优先权、收益反哺等制度化设计，推动农民从单纯劳动力供给者转向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共同治理的共生主体，让协商参与与长期利益深度绑定，以稳固的利益共生关系夯实参与基础。

第二，以协商效力等级体系为抓手，提升共生模式的运行效能。针对协商成本偏高、议而不决、闭环虚化等现实问题，以分类治理与刚性约束提升共生模式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三级协商效力等级体系，对村级小额事务实行咨询性协商，突出高效快捷。对公共服务、环境整治等常规事务实行建议性协商，充分吸纳民意、依规办理。对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实行约束性协商，赋予协商结果法定效力与强制约束力。以协商效力等级对应办理层级与督办强度，实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在产业议事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强化市场化共生执行机制，更多依托合作社纽带、产业链协同与利益共同体推进决策落地，以互惠共生动力替代单向行政指令，提升协商成果的转化率与执行力。

第三，以社会信任培育与四维协同为支撑，构建共生环境的长效保障机制。在政策、技术、文化支撑基础上，将社会信任环境纳入共生支撑体系，形成政策、技术、文化、信任四位一体的协同赋能格局。强化政策制度刚性赋能，将“村民说事”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与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明确经费保障、人员配备与考核权重，以稳定制度预期降低共生交易成本。推进数字技术普惠赋能，持续优化直播议事适老化改造，完善线下代办、上门说事等兜底机制，破解居住分散、老龄化带来的参与阻隔。深化乡土文化浸润赋能，将本土文化嵌入议事全过程，以文化认同培育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重点激活乡村社会信任资本，立足熟人社会特质，依托乡贤声望、村规民约与长期议事实践构建有温度的监督、有底线的信任，将人情社会转化为降低协商成本、提升监督实效的积极社会资本，以信任固本夯实共生运行的深层基础。

综上，推动“村民说事”提质升级、长效运行，必须始终坚守共生理论的内在逻辑，牢牢把握对称性互惠共生这一核心要义，从共生单元结构优化、共生模式效率提升、共生环境系统支撑三个层面协同发力。通过利益联结制度化强化共生单元，通过协商效力等级化创新共生模式，通过信任环境培育优化共生生态，推动多元主体从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共生、从利益博弈走向互惠共赢、从运动式推进走向制度化运行，从而真正破解西部乡村农民协商参与的现实制约，让“村民说事”成为稳固基层民主、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化平台，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具解释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注释：**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501/t20250123_883232.html.

② 遵循既有学术研究惯例，本文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以首字母编码形式进行匿名化处理。

③ 访谈样本编码规则：采用“年月日-乡镇/村落首字母-姓名首字母”格式。其中，前6位数字为访谈日期，中间为乡镇或村落拼音首字母，后为受访者姓名拼音首字母，全文统一使用。

④ JY市情简介.http://www.jiangyou.gov.cn/jysrmzf/c104341/201904/e91c7beda2a840eda93f0c97ef79e259.shtml?only=true.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 靳永翥，赵远跃. 基层治理变革中的乡村治理制度创设研究——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切入口[J]. 治理研究，2021，37(2)：82-91.

[3] 孙枭雄，仝志辉.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20(1)：17-28.

[4] 王国勤. 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以象山“村民说事”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2018(12)：26-34，155-156.

[5] 郎友兴，万莼. 乡村治理制度形成、演变与运行的机理——基于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的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22(3)：69-76，158.

[6] 付翠莲，吴帅.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J]. 理论与改革，2019(4)：72-84.

[7] 季丽新，张寒. 农村社会稳定视阈下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5(11)：56-60.

[8] 张新文，陆渊.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44-57.

[9] 肖克，王寒. 场域共通、权利共促与信任共建：协商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三重逻辑[J]. 理论月刊，2026(4)：29-41，158-159.

[10] 张喜红，张昕. 从共在到共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设路径[J]. 理论学刊，2025(4)：94-103.

[11] 钱泽森，郑淋议，洪甘霖. 从远郊到城中：村城融合型都市乡村发展模式何以生成——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5(5)：83-93.

[12] 王庆生，张行发，郭静.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3)：108-112.

[13] 胡海，庄天慧. 共生理论视域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共生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2020(8)：68-76.

[14] 王进，冯仁丽. 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理——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多案例分析[J]. 世界农业，2025(10)：91-104.

[15] 王洛忠，徐成铭.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影响因素与实践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2026，42(3)：112-121.

[16] 刘林，樊志鑫.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关联、显著优势与创新路径[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9(2)：17-25.

[17] 翟云，吴旭红，范梓腾，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系统性探索：理论逻辑、实践创新与治理跃升[J]. 电子政务，2025(9)：2-31.

责任编辑：曾凡盛